

新文学资料引论



朱金顺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新文学资料引论

朱金顺 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新文学资料引论

朱金顺 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印刷厂印刷

32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6.625印张 169千字

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7,000册

统一书号: 10411·1 定价: 1.50元

序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十年浩劫结束得以恢复。痛心于十年摧残和停顿所造成的严重损失，研究者们为了追回失去的光阴，不遗余力地运笔劳作，终于换来了有目可睹的新局面。这是令人欣慰的。平时，我很在意阅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一类文章，因为从那里了解一个时期的研究状况是最便当的。在阅读中，对于作者点评到的而自己未曾读过的一些研究成果，往往产生了兴趣，发我深思，催我去细读，因此，这类文章对我来说，又有索引的作用。可以说，在我脑海中形成的现代文学研究欣欣向荣的局面，和读这类文章有很大关系。然而，我有时又不免沉思：这些年来资料建设的成就及其对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似乎肯定得不够。我们设想一下，假若从从事现代文学工作者的成果总目录中抽去资料部分，怕要严重影响对于研究状况的估价。即使从事情的另一面——理论著述而论，每一项成就的取得谁能说与资料无关？多年来，对一些文学现象和受到过不公平待遇的作家进行重新评价的文章，在报刊上屡见不鲜，毫无疑问，这是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结果，而历史唯物主义不正是要求人们从实际出发，用事实说话吗！我们恰可用这个无人不晓的道理来印证这一类文章，它们之有说服力，归根到底在于作者将所掌握和发掘的丰富可靠的资料运用在文章中；对有些在现代文学史上曾产生过影响而过去被忽视了的作家，近几年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这也是为学术界公认的新进展，然而正因为过去被忽视了，他们的生平资料缺乏积累，他们的作品需要搜集，离开这第一步的资料工作，怎么能

进入研究，怎么能写出文章呢！至于东北地区文学、孤岛时期文学等，更以填补了过去研究中空白的意义，被视作构成研究新局面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实事求是地讲，到目前为止，它们所给予新局面的很多贡献，基本上还是资料，理论上的分析和探讨的成果，不能说没有，但大量的出现还有待于今后。仅举这几个方面情况，我想人们也许可以体会到资料成果在已形成的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

中国现代文学资料建设绝非近几年事，在它的发生和发展直至今天六十多年的过程中，资料工作总是伴随着研究工作深入进行着。回顾历史，我觉得以往的资料工作已经走过了三个阶段：建国前为第一阶段，可谓开创阶段。其间许多学者名家做了功不可没的工作，留给我们的资料颇多，有属于文学论争和文学思潮的；有属于作家研究的；有属于书刊编目和文章索引的；有属于作家作品的；然而因为这些都是在行进中的工作，即使象基于有组织有计划而产生的《新文学大系》中所留下的资料，在今天看来，毕竟也是单薄的、零散的、不全面的。第二阶段（1950—1966），可谓勃兴阶段。这期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被确认为一个学科，研究和教学工作迫切要求有足够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大批热心资料工作的人，有关部门和出版界也给予这项工作以极大的支持。以资料书籍而论，出于配套设想的就有上海文艺出版社包括甲乙两种分类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丛书》的计划；还有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此外单项的资料，刊行的数量也相当大。正当资料的建设刚刚呈现勃兴之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和所有的研究工作一样，资料建设也无法进行，一下子停顿了十年。第三阶段（1978—1984），可谓深入阶段。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重整旗鼓，准备继续进行中途受挫的事业，到了1978年，资料建设又充满了生机。引人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根据各地现代文学工作者

的意愿，召开了资料工作会议，总结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规模空前的资料建设计划，此后，一项《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聚集了全国六十多个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三、四百人参加编选工作。除此之外，各地区各部门出版的各类资料书籍以及作家的全集、文集举不胜举。较之以前，资料建设更全面、更系统了。人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强调搜集第一手资料，全面反映文学运动、思潮、论争与社团发展变化的真实面貌，对于一个作家之是否编选研究资料，也是从历史实际出发，凡在一定时期产生过较大影响的，都可进行。在这些原则指导下，过去在“左”倾思潮影响下不可能从事的一些项目，都陆续编选出来了，为填补研究工作的空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在资料建设蓬勃发展的势态中，显露出一些弱点，其一，同类资料没有新意的重复出版，如作家作品选，作家传记资料；其二，某些资料粗糙，缺乏考订，甚至夹有伪品；其三，尚有理应进行，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无法进行的工作。这些都说明，资料建设需要向科学化方向迈进。在我看来，走向科学化需要解决两个方面问题，第一，要把资料建设作为一门学问，从事此项工作的人要有专门的修养和知识；第二，应该做到全国一盘棋，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出于这种认识，我在一九八四年提出一个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这建议是经过我对必要性和可能性两个方面认真的思考而提出的，而有的高等学校正在或准备开设“史科学”专题课的创举，更是我提出这个建议的促进因素。

提到高等学校开设“史科学”专题课，我首先要想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朱金顺同志，据我所知，他是第一个讲这门课的人。在他刚开始讲课的时候，我便有一种预感，中国现代文学被公认为一个学科，不是起因于在大学里讲这门课吗？现代文学史科学也必将从讲课开始而成为这个学科的分支。

金顺同志的讲稿《新文学资料引论》整理出来了，作为在它

出版前的一个读者，我感到十分荣幸。现在得知此书就要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我的激动也许不亚于作者。我非常佩服出版社决定者的卓识、大度。读者是不会忘记他的。眼下，书稿第二次摆在我的案桌上，面对着它，我在思索如何完成作者交给我在书前写点什么的任务。因为我鼓吹过建立“现代文学史科学”，所以我自然地想到，它的出版一定会对这门学科的建立起重要作用，它该是这门学科第一部理论著作，因此，我甚至视它是一块奠基石。

在《新文学资料引论》中，作者以其很深的业务功底，从史料学的意义到这个领域里的各方面的理论、知识——加以论说和介绍，在现代文学资料工作的实践上，该书的指导作用是分明存在的；该书是为教学而写成的，作者称它为“引导青年学子入专业研究的小册子”，这里包含着作者的谦虚，不过，我也恰恰由此看出了它在培养史料学方面专门人才的价值。我还联想到全国很多高等学校都为培养人才而开设这门专题课，这就使人有足够的理由对一支有修养的史料工作者和史料学研究者的队伍的形成持乐观态度；由于作者不是孤立、抽象地阐发理论、介绍知识，而是通过列举以往资料工作存在的弊病和研究工作中在史料运用上的失误，这不仅有助于对理论知识的接受和掌握，而且对纠正研究工作中某些偏颇也有重要作用，由此，倒也显示出一个长于资料工作的人，对于学术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往往独具慧眼，能够抓住问题的本质。这就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掌握可靠的史料、有辨识史料的能力，对一个研究工作者是多么重要；该书对于研究工作来说也有方法论的意义。金顺同志在一封信中对我说：“我写小册子时的指导思想，就是打算用乾嘉学派的思想和方法”，“今天有不少人在介绍、研究西方的研究方法，这我不反对；但我认为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清代朴学精神，在我们现代文学研究中，也是应予继承的。他们爬梳史料、考据、校订的本领，也应当学习和发扬”。我很赞同金顺同志的这种态度。朴学，从明

清之际作为导源者的顾炎武开始到乾嘉时朴学形成后的代表者惠栋、戴震，他们的一些主张，对于我们是有借鉴意义的。虽然我们应该看到在朴学的推行中夹有一种为考据而考据的脱离实际的学风；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漠视它在整理古籍，疑古辨伪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顾炎武之推崇学术研究要有朴实学风，反对空谈义理，这种治学的精神，在今天也有实际意义，难道我们能称不从实际出发，空发议论的文章为好文章吗！铸钱必须从“采山之铜”入手，（出自《日知录》），作文章也同此理，不去搜集和掌握有用的材料，怎么行呢！再看戴震的佳论：“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孟子字义疏证》），就是说，只有对事物进行周密细致地考察，方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认识事物的规律。我们今天不仍可以用这个道理来检查和要求自己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金顺同志在书中从现代文学资料出发，对于考证、版本、校勘、目录等诸多方面学说，不仅作为知识来介绍，而且告诉你从事这些工作的具体方法，因此该书的实用价值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金顺同志实现了自己著述的意图，金顺同志不会遭到误解。有前面我引他的话为证，他并不排外、保守；有他的著作为证，他没有忘记从中国传统中吸收有用的东西。

最后要说的是该书在文字上具有质朴的风格。作者用的是通俗易懂的语言，是否会有人因此说它“浅”？然而我却喜欢这“浅”，而且由此我更敬佩作者，因为他能用浅显质朴的语言说透了许多深奥的道理。“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闲情偶寄》），李渔的这话自然带有强调的意味，但却是发人深思的。

马良春

一九八六年六月五日

目 次

绪论

1. 资料学的意义…………… (1)

资料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现代文学研究中资料工作的特殊问题——资料的专门研究

2. 研究的内容及范围…………… (5)

版本——校勘——目录——考证的方法——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3. 学习的目的和方法…………… (8)

4. 建立资料学的新体系…………… (9)

一、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1. 搜集资料的原则…………… (12)

详细占有材料——历史的观点——发现新材料——随时加以选择——锲而不舍的精神

2. 搜集资料的方法…………… (16)

竭泽而渔——因类以求——因代以求——因人以求——双方并求——按图索骥——发掘和钩沉——札记册子——摘要和卡片

3. 介绍常见的资料研究成果…………… (26)

辑佚钩沉著作——专题研究资料——作家研究资料——汇校汇释集解——考辨札记和文坛史料——年表年谱和大事记——目录和索引

二、考证篇

1. 概说…………… (45)

清代的考据学——新文学考证的特点

2. 考证释例…………… (49)

占有丰富的材料——善于发现问题——史料订误——排比方法立论——佚文的考订——“孤证”亦可成定说——掌握新材料——旁证充分可以得到切近的结论——考据的线索

3. 失误举隅..... (64)

牵强附会之失——证据不足之失——回忆有误之失——杜撰史料之失——时代错误之失——单凭推理之失——因第二手材料之失——为贤者讳之失

4. 注释..... (77)

条目选择要适当——内容翔实、考证精确——注文要宁缺毋滥——注释取客观态度——言简意明

三、版本

1. 略说..... (83)

2. 新版本释名..... (84)

铅印本、影印本、拓本——线装、平装、精装及毛边书——精印和普及、原版翻版和盗版、丛书和单行本、合订本和抽印本、通行本袖珍本和签名本、禁书和绝版书——封面、插图、扉页和版权页——版次的名称和记录法——藏书印、藏书票、批本、题词

3. 新善本的确定及其意义..... (110)

确定新善本的标准——版本研究的重要性

4. 版本学的别支..... (124)

题跋、藏书记——书话

四、校勘

1. 略说..... (131)

2. 底本的选择和确定..... (132)

所谓底本——新文学确定底本的特殊问题——确定底本的原则

3. 校勘方法简介..... (139)

死校与活校——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

4. 新文学学校勘的注意事项..... (151)

笔误、误植要改——避讳问题——补上被删的文字——择善而从问题——占有全部材料

五、目录

1. 目录学的范围及其他..... (161)

目录释名——目录学的范围——目录学对新文学研究的意义

2. 专题目录..... (164)

解说——编制法

3. 作家著述及研究资料目录..... (171)

著译系年目录——著译书目——研究资料目录

4. 索引..... (188)

索引释名——索引的种类——索引的编法

〔附录〕 参考引用书目..... (190)

绪 论

1. 资料学的意义

《新文学资料引论》，是一部入门的书，它为有志于研究现代文学的青年朋友们做个向导，指引大家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资料的研究并不是他的结局，而是起始；但也是必不可少的发端。

资料工作是艰苦的事业，但也是极有兴味的一件事。要把问题讲清楚，恐怕需先从资料学的意义说起。

首先，应当说明资料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资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没有充分的材料，什么论或史都不能建立起来。即使有了什么正确的观点，那也仅仅是空论，发空论是绝对没有说服力的。所以，任何研究都需要从熟悉资料、把握资料入手。这是一般的规律，也是不需要烦琐说明的道理。

但是，事实上并不如此，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资料工作还相当薄弱，我们还没有一部资料丰富、翔实的多卷文学史，无论是论争，还是作家论，也都缺乏足够的材料供我们使用。通常的情况是，有些材料是大家用了又用，而治史或治论，都是议论多而资料不足。

鲁迅先生有一部《中国小说史略》，是学术界公认的开山之作。我们只要熟悉它，就会明白那种“史略”是建筑在多么丰富的史料的基础之上的。而他在治此事之前，做了古小说的大量占有、辑佚、考订工作。《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及《小说旧闻钞》都是资料工作的巨大成果。用它比之于现代文学研究方面，这种基础工作是多么不够啊！

其次，要认识现代文学研究中资料工作的特殊问题。

做研究工作，材料的使用，首要的是鉴别。鉴别真伪，考订其准确性。郭沫若先生在讲到古史研究时说：

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

研究中国古代，大家所最感受着痛苦的是仅有的一些材料却都是真伪难分，时代混沌，不能作为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素材。¹

这话对我们现代文学研究同样适用，材料的鉴别也是我们研究工作的基础阶段。这里，也许有的同志会说，古代留下的材料真伪难分，需要鉴别，新文学时代很短，那有真伪问题呢？我说这话不对，它也有个资料鉴别问题。我们不妨举出一件小事：在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中，在分析某部作品时使用的原文，是否多为解放后版本？写某个作家的评传，援引的作品原文，是当时的文字，还是后来的修改本？据我考查，往往用解放后作家的“定本”——即修改本，这种本子，往往不同程度进行了修改和润色。如果给新中国的一般读者阅读，“定本”自有它的好处，自有它改动的理由；但做为研究的材料，用这种本子是不科学的，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在版本的使用上，不是给研究者提出了鉴别的任务吗！选择什么版本做研究素材，此中就大有讲究了。

最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了一部《叶圣陶散文·甲集》，收有解放前散文二百一十篇。叶圣陶先生的散文，解放前收集的不多，出这样一个大量的选本，是很好的。但是，是怎样入选呢？据叶至善同志说：“从报刊上复印下来的文章，他（指叶圣陶先生——

¹ 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沫若文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1月版第1—5页

引者)怎么看得清楚呢?至诚只好工工整整地用大字抄了给他看。看的时候,他未免作些改动,不是改动原来的意思,是读了早期写的白话文感到有些疙瘩,不顺当,不舒服。渐渐地,这样自己看,自己改,又成了我父亲的日常工作之一。他说,现在这样编倒还有点新意;还吩咐我们某几篇可以不要,总之要从严选,宁缺无(毋)滥。”^①果然,所收文章篇篇都做了改动,在每篇之后都注明了原刊处和修改的时间。这本书,如果给今天的读者阅读,自有它的好处:不光语言顺当了,而且有了新意。但是,如果用做现代文学的研究素材,却失去意义,我们不能用它做材料,只好求诸原刊本了,尽管那些报刊已经很难寻觅了。

做研究工作,次要的是资料的发掘和整理。若从历史说,时间比较近,不过几十年;但由于这是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三十年,许多材料都散失了。因此,我们要发掘资料、收集资料,并加以整理、出版,以提供出较为丰富的原始资料来。资料的发掘工作,是艰苦的;而整理起来又那么细琐。从当前的现状看,它往往并不被重视,仿佛这项工作算不得研究,考据性的文章也算不得论文。因此,不少青年朋友不愿从事这项工作。实际上,如果离开了新文学史料的发掘和整理,那研究工作也很难进行和深入,也不容易取得研究的新成果。

这项工作虽则艰辛,却也有乐趣。正如叶至善说的:“收集材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也是一件极其有味的事,象挖矿似的,挖的时候确实辛苦,挖到之后的高兴也无法形容。”(《编父亲的散文集》)这种乐趣,是没有从事过发掘工作的同志很难体会的。不光有乐趣,史料的发掘也确实推动了研究工作,例如,一九七五年,中山大学的同志发现了鲁迅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一九七五年,鲁迅给日本译者的八十五条《阿Q正传》注释的发现和出版,一九七八年,《陕北特区特写》的被发掘出

^①叶至善:《编父亲的散文集》,《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出版。

来，都对我们的研究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做资料工作，再次应当排除各种干扰。研究工作，总是有各种干扰的，这尤其表现在资料上。时代越近，干扰越大，这是不以人们的愿望而改变的客观规律。时代近，本人活着，或者亲属子女活着，总会以各种形式来干扰我们的研究工作。为什么会干扰呢？原因是相当复杂的。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曹操写文章胆子很大，得力于通脱不少。他举例说：“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鲁迅全集·而已集》）郑康成就是郑玄，后汉著名的经学家，他生存的年代，距曹操约二十多年。诗中用了他的事，鲁迅就认为大胆，因为语涉时贤是要有麻烦的。曹操所做，或者也可以认为是排除了干扰，对他做诗的干扰。

我们研究现代文学，总要涉及文学史上的人或作品，有个评价问题，有个资料的发掘问题，这都会受到干扰的。钱钟书先生说：

考古学提倡发掘坟墓以后，好多古代死人的朽骨和遗物都暴露了；现代文学成为专科研究以后，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而暴露了。被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不想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假如作者本人带头参加了发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偿失，“自掘坟墓”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掘开自己作品的坟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①

这段话极为坦率，虽然钱先生讲出了担心之处，但还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欣然同意《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两书重印了。而他讲出的道理，说出的担心处，恐怕正是一些作家及他们的亲属子女，干扰我们研究工作的原因了。他们往往以

^① 钱钟书：《〈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人·兽·鬼》，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出版。

“悔其少作”的心情，不愿把过去的东西再公诸于众，或者进行了删削篡改再拿出来。为了保全自己或先人的虚名，总要干扰我们的资料工作；而我们从事资料发掘、研究、整理的人们，必须排除种种干扰，给读者以历史的本来面貌。

最后，应当强调资料的专门研究。资料的专门研究，可以称为资料学。从整个现代文学研究说，资料研究仅仅是一个部门，或者还是一个较为次要的部门，但也是一个不能缺少和忽视的部门。

资料学虽则是一个部门，却有不少独特的地方，这是一般论或史所不能代替的。它所研究的内容，好象处于从属地位，在整个研究工作中，唱配角而不唱主角。但那些方法和门径，却是别一途的。这门学问，类似边缘科学，常常使用一些实用学科的手段。它的研究不在于提出一个惊人的论点，也不在于系统地阐述历史规律；而是为一切史、论制造论据，提供佐证。虽然这是材料的爬梳、考辨工作，却有它独立的价值。

资料学以其科学的价值受到重视，有着独立存在的意义。

2. 研究的内容及范围

资料学研究的对象是资料，各类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而研究的内容，则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版本。研究新文学出版物的各种版本，认识在学术上的优劣，明白一种书各种版本的源流。如此等等，为进一步治史、治论提供好的版本和可靠素材。古书版本鉴定，是一种专门学问，新版本虽然没有那么复杂，但新善本的考订和研究，也是新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二，校勘。一书不同版本的校勘，对于异文的研究和考订，定取舍、找源流，认识它们的优劣，知道多种异文出现的原因。通过校勘，可以定出善本的善文，明白史、论工作应当依据的文字，也能够从中了解时代的烙印和作家的思想发展脉络。校勘是

一种手段，是一种比较、认识书籍版本的好方法。勘校之后，也可以得出成果——写校勘记，编汇校本。

与校勘有极密切关系的，则是注释，古人往往把校释工作合在一起进行。新文学注释工作，不象古籍那样任务繁重，但也有其独特之处，必要的注释，却是不可少的。

第三，目录。目录之学，是研究的入门学问，也是独立的一个门类。我国古代目录学研究，非常发达，它是人们研究一门学问的向导。新文学以来，目录学研究较为薄弱，近几年才略有发展。目录之学，应当是资料学的重要内容，通过新目录之研究，既可为学人提供研究的线索，又可成为一种独立的著作。各种目录的编纂制定，都需要辛勤翻检、细心编订。

版本、校勘、目录三者，是各自独立的，都是资料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古代，因为三者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往往划不清界限，甚至有人是合起来研究的。因为，古代在进行大规模的图书整理时，总要广收异本，进行校勘工作，然后进行分类庋藏，编制目录和撰写提要。这样，校勘、版本、目录就合在一起了，例如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就是如此。但在近现代，它们各自独立，都有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了。在新文学的资料学范畴内，这是三个独立的、关系密切的门类，不可相混的。但是，

“在厘定篇章，比勘文字，探求版刻源流，鉴别版本优劣，部次群书，条别异同，推阐大义，考镜源流中，三者是相互为用，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①

第四，考证的方法。在资料研究中，考证是广泛应用的。本来，考据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它在古典文学研究或其他学科研究中，都要使用。这门学问，也要应用于新文学的资料研究中，无论是资料的鉴别真伪，还是版本的寻求源流，还是校勘的择善而从，还是目录的考订，往往都要进行考证。考证的方法，也是资料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① 《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1982年3月版第12—13页。